

霸权控制与福利挟持：美国军事援助与西欧福利国家建构^{*}

崔磊 卢凌宇

内容提要：西欧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是国际社会效仿的典范，但此成就却受制于美国霸权。美国通过提供军事援助等“枪炮”领域的安全支持，承担了西欧国家的防务职能，使后者得以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社会福利等“黄油”领域。基于1950—1967年的数据，综合运用回归分析、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来评估平均效应、必要效应与充分效应，本文发现美国军事援助显著地促进了西欧福利国家建构，且在充分条件组态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美国军事援助在显著地推动西欧国家实现高福利水平的同时，也使其陷入“高福利锁定”的困境。随着美国逐步在“枪炮”领域“撤梯”，西欧国家受到“高福利锁定”的结构性约束，导致其难于调整军事安全政策，更加依赖并受制于美国霸权。

关键词：美国军事援助 西欧福利国家 集体行动逻辑 “枪炮” “黄油”

引言

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剧变，尤其是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战略压力的增强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引发了西欧国家对美国集体安全承诺更为深刻的疑虑与担忧。相应地，西欧国家在战略自主方面的诉求愈发强烈。2016年6月，欧盟发布《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工作站(立项号:2022GZZH01)和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西欧福利国家建构”(立项号:2023Y0270)资助的研究成果。感谢《欧洲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①明确提出加速推进欧洲战略自主的必要性。^②尽管如此,欧洲战略自主化进程仍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军费支出领域。相关研究显示,俄乌冲突显著加剧了欧洲面临的安全威胁,尽管多数西欧国家的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略高于2%,但仍低于2.5%。^③对于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西欧主要国家而言,2%的军费支出占GDP比重显然不足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潜在军事威胁。换言之,尽管这些国家已达到北约设定的2%的门槛,但此支出水平仍未能满足应对潜在军事冲突的基本需求。因此,西欧战略自主受到防务能力严重短缺的制约,且在短期内难以通过财政调整或军备强化等方式得到有效弥补。^④与之相对,社会福利建设作为西欧国内政治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却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而导致在“枪炮”和“黄油”领域的投入高度失衡。

由此引发学界对于西欧国家“枪炮”与“黄油”权衡的思考,即为何军事安全建设作为国内政治关键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 西欧高福利制度是否成为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控制的工具? 实际上,西欧国家相对低水平的军费支出和高水平的福利制度源于美国霸权的运营和操作。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对西欧国家的投入,为后者提供了短期内无需在非生产性领域进行大量投资的战略优势,使这些国家能够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优先集中于社会福利建设。然而,这种依赖关系逐步将西欧国家置于双重困境之中,即福利支出“易上难下”的特性与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逐步减少支持的“撤梯”策略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矛盾。西欧国家的“高福利锁定”状态导致其必须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从而限制了在军事安全领域的资源投入。同时,美国逐步削减对西欧的安全支持,且西欧未能有效建立自主防务能力,这进一步加剧了西欧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正如梅杰(Hugo Meijer)和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所言,欧洲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几乎为“幻想”。如果美国从欧洲撤出,西欧将变得更加脆弱,难以有效应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⑤ 总之,美国通过福利“挟持”实现了对西欧国家的霸权控制。同

① 此为欧盟全球战略(European Union Global Strategy, EUGS)的全称。

②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June 2016,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gs_review_web_0.pdf.

③ Clara Falkenek, “Who's at 2 Percent? Look How NATO Allies Have Increased Their Defense Spending Since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tlantic Council, 8 July 2024,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econographics/whos-at-2-percent-look-how-nato-allies-have-increased-their-defense-spending-since-russias-invasion-of-ukraine/>.

④ Hugo Meijer and Stephen Brooks, “Illusions of Autonomy: Why Europe Cannot Provide for Its Security If the United States Pulls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5, No.4, 2021, p.9.

⑤ *Ibid.*, pp.9-11.

时,西欧国家的防务外包也被美国霸权反噬,在安全领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脆弱性。

一 西欧福利国家建构的因素讨论

既有研究从国内和国际视角对西欧福利国家建构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内源性因素主要聚焦于国内政治领域,而外源性因素主要关注国际层面的影响。

(一)内源性因素

内源性因素主要包括工业主义与经济发展、财政汲取能力和权力资源理论等。当然,国内政治纷繁复杂,诸如政治制度、宗教力量、君主制遗产等因素在部分研究中也有所涉及。^①然而,这些因素要么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要么仅是上述主要因素的衍生物。因此,鉴于它们对主要议题的贡献相对有限,本文不对这些因素进行单独讨论。

1.工业主义与经济发展

工业主义的核心在于传统社会与新兴工业化社会之间责任职能的承继转变。随着现代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社会中承担保障职能的教会、行会等组织已逐渐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进而被边缘化或被解构。^②为填补这一空缺,新的行为主体、制度安排和政策平台相继出现。在此过程中,政府作为主要的社会保障提供者,必须主动承担起社会福利的责任,以确保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简言之,工业化催生了社会保障。^③正如周弘所言,“一般都是先有工业化,再有社会保障”。^④工业化进程为国家积累了财富,显著提升了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经济能力。由此,学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必然性观点,即当经济发展达到特定阶段和水平时,国家将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福利制度。经济增长为国家推行福利制度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基础,而福利制度的建立也被视为经济增长的自然延伸。^⑤

2.财政汲取能力

^① Markus Crepaz, “Inclusion Versus Exclusi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fare Expenditur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1, No.1, 1998, p.63;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4, No.2, 2000, p.263; 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29, No.4, 2000, p.513.

^② 周弘:《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框架》,载《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第1-3页。

^③ Elinor Scarbrough, “West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The Old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38, No.2, 2000, pp.227-233.

^④ 周弘:《我的学术方向·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4月12日,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4/t120230412_5619361.shtml。

^⑤ 吕普生、吕忠:《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研究传统及新取向》,载《中国公共政策评论》,2017年第2期,第17页。

福利国家建构依赖充足的财政支持,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能否获取足够的资金。财政汲取能力通常通过税基规模、官僚机构效能和纳税意愿进行衡量。其中,税基规模是“纳税人的数量”,呈现出“国家的经济体量和发展潜力”。^①较大的税基规模意味着政府能够从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中获取更多税收收入,从而增强其财政支持能力。相反,较小的税基规模则限制了税收收入的增长,进而缩小政府实施各项政策的财政空间。官僚机构效能指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效率与能力。高效的官僚机构能够有效地推进“汲取对象的锁定和追踪、汲取方案的制定和贯彻”。^②相关研究表明,高效的官僚机构显著地推动了福利项目扩张,因此,官僚化程度也被视为关键影响因素。^③纳税意愿承载着社会对于国家征税行为合法性的认同度。尤其在国际战争冲突或社会动荡阶段,民众的集体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容易被激发,从而增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使其能够动员更多资源用于公共支出。此外,当国家从战争或动荡状态过渡至平时时期时,纳税意愿可能表现出滞后效应或位移效应,导致高税收制度在和平过渡阶段持续较长时间,难以立即回落至常态水平。^④如皮科克(Alan Peacock)和怀斯曼(Jack Wiseman)在探究英国公共支出增长问题时发现,政府支出增长的波峰与英国战争或备战阶段相重合。^⑤总之,财政汲取能力对福利支出的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3. 权力资源理论

西方民主选举机制使得劳工群体能够将人数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从而与在经济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形成对立的权力资源。^⑥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分裂往往会激化两者间的冲突,导致政治与经济领域中的权力博弈。这种对立与博弈有可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和福利政策调整的内在动力。^⑦所以,劳工阶级及普通民众通过控制和动员关键的“权力资源”或“政治资源”,能够在政治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推动社会待遇的提升与福利制度的变革。

① 卢凌宇、许剑:《因“祸”得福? 石油进口依赖与发展中国家能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129页。

② Jill Quadagno, “Theories of the Welfare Stat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13, 1987, p.118; 卢凌宇、许剑:《因“祸”得福? 石油进口依赖与发展中国家能力》,第130页。

③ Jill Quadagno, “Theories of the Welfare State,” p.118.

④ Douglass Cecil 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6.

⑤ Alan Peacock and Jack Wiseman, *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xxi-xxiv.

⑥ 本文中的“民主”一词,如非特别说明,均指代西方民主。

⑦ 李琮:《对“福利国家”的一些认识》,载《西欧研究》,1986年第1期,第2-3页;丁东红:《论福利国家理论的渊源与发展》,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第55-56页。

权力资源中的政党因素能够影响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左翼政党通常更加关注社会平等和福利议题,被视为推动公共社会支出扩大的关键力量。^① 相较之下,右翼政党由于其保守的财政政策倾向,往往会限制国家税收和社会支出的增长。因此,政党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福利水平的高低。同时,政党间的竞争程度能够显著激发政党在社会福利政策中的投入。例如,天主教政党与左翼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往往促使执政的左翼政党在公共支出方面加大力度,以回应选民对社会福利的需求。^②同时,权力资源中的民主制度被普遍认为是西欧福利国家扩张的关键因素。^③随着民主的深化,民众对社会福利和政治参与度的需求增强,进一步推动政府增加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上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此外,民主制度所塑造的选举竞争促使候选人关注公众对于公共开支增加的诉求,并将其纳入竞选纲领,借此提高选民的支持度。^④

(二) 外源性因素

外源性因素主要包括国际战争和冲突、政治制度竞争、美国的安全保护和经济全球化。

1. 国际战争和冲突

国际战争和冲突通常会引发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深刻变革。从供给端来看,国际战争和冲突会导致国家能力迅速增强,并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为战后社会福利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有利条件。^⑤同时,该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内改革阻力,减少福利制度建设的限制性因素。从需求端来看,国际战争与冲突的破坏性后果迫使国家在战后提供社会安全保障,以应对潜在的社会危机。相关诉求包括但不限于伤残军人的医疗救治、阵亡军人家属的抚恤金发放、复员军人的安置和再就业支持、缓解战争对平民生活造成的长期负面影响等。^⑥此外,该因素促进了福利制

^① Walter Korpi, "Power, Politics and State Aut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tizenship: Social Rights During Sickness in Eighteen OECD Countries since 193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4, No.3, 1989, p.323; Gøsta Esping-Andersen,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The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7-38; Ingmar Schustereder, *Welfare State Change in Leading OECD Countries: The Influence of Post-Industrial and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s*, Gabler Verlag, 2010, pp.15-16.

^② Peter Flora and Arnold J. Heidenheimer, eds.,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1, pp.345-383.

^③ Tim Dorlach, "The Causes of Welfare State Expansion in Democratic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Literature Review,"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Vol.55, No.5, 2021, pp.772-773.

^④ R. Douglas Hecock, "Electoral Competition, Globalization, and Subnational Education Spending in Mexico, 1999-2004,"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0, No.4, 2006, p.954.

^⑤ Herbert Obinger, Klaus Petersen and Peter Starke, eds., *Warfare and Welfare: Military Conflict and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8-9.

^⑥ 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97页。

度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例如,参与国外战斗的士兵可能将其他国家社会保障的政策和经验带回本国。又如,政治精英在他国的短期居住或流亡经历,亦使其有机会深入了解所在国的社会政策,并在回国后积极推动相关福利政策的变革。古丁(Robert Goodin)和德雷泽克(John Dryzek)指出,战时经历能够带来慷慨的战后社会保障。^①

2. 政治制度竞争

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下,西欧国家普遍面临经济萧条、大规模失业等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反观社会主义阵营,它们却依靠终身就业保障和低失业率展现出制度优势。因此,美苏冷战的威胁和潜在的政治制度竞争压力促使西欧国家于军事防御之外,在社会保障和意识形态领域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展开竞争,因而提升了社会福利水平。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恐惧催生了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高收入水平和不断壮大的工薪阶层,并推动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福利竞争。^② 奥宾格(Herbert Obinger)也补充道,战后福利国家的大规模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冷战期间两个敌对阵营在政治竞争下产生的“恐惧”的副产品。^③彼得森(Klaus Petersen)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社会福利政策来确保西欧民众的忠诚,并借此塑造出优越的国家社会保障形象,以此作为对抗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手段。^④ 所以,西欧国家的福利建构源于冷战初期东西方阵营之间激烈的政治竞争,该竞争促使“铁幕”两侧的福利国家在规模和程度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3. 美国的安全保护

美国的安全保护促使西欧国家能够更加专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于西欧国家而言,它们满足于让美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做出重大决定,而自己则专注于变得更加富有。^⑤ 在美国集中精力与苏联展开竞争时,西欧国家则借此机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推动了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同时,美国的安全保护有助于缓解西欧国家间的矛盾,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仍然为欧洲所忌惮,尤其是法国。美国通过安全保护促进西欧一体化,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开始,努力平衡各国的战略目标与政治诉求。法国通过欧共体调动西德资源,以恢复其

^① Robert Goodin and John Dryzek, “Justice Deferred: Wartime Rationing and Postwar Welfare Policy,” *Politics & Society*, Vol.23, No.1, 1995, p.65.

^② Eric Hobsbawm, “Goodbye to All That,”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90, p.21.

^③ Herbert Obinger and Carina Schmitt, “Guns and Butter? Regime Competi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during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63, No.2, 2011, pp.246-270.

^④ Klaus Petersen, “The Early Cold War and the Western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Vol.29, No.3, 2013, pp.226-240.

^⑤ Ronald Steel, “NATO’s Last Mission,” *Foreign Policy*, No.76, 1989, p.84.

大国地位,而西德则借此机会获得国际认可,确立“良好公民”的身份,从而有效化解了“德国问题”,^①法德和解得以实现。同时,英国和荷兰通过北约制衡法德的影响力,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西欧国家内部分歧的化解使得它们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推进经济建设。鉴于经济发展与福利开支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可以确定美国的安全保护所创造的有利经济发展环境,促使西欧国家将政策重心转向福利建设。

4.经济全球化

学界对经济全球化与西欧福利国家间关系具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坚信“经济全球化促进福利国家扩张”的观点,^②认为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内经济和社会的脆弱性,使其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从而引发深层次的经济波动和社会危机。为了缓解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社会冲击,国家需要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与公共福利体系的建设,通过这些政策手段稳定社会结构,并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而认同“经济全球化引发福利国家收缩”观点的学者则指出,^③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国家主权忧虑,尤其是对于资本力量可能支配与约束国家政策的恐惧。资本力量通过影响国家政策,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竞争性下行,即国家间在全球化压力下展开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竞争。此外,福利支出还受到经济全球化的非线性效应和不相关效应的影响。非线性效应融合了福利扩张和福利收缩的内容。当经济全球化水平较低时,国家往往倾向于扩大福利国家的规模和水平;而在经济全球化水平较高时,则可能出现福利支出减少与社会保障体系紧缩的情况。^④不相关效应则认定经济全球化和福利支出两者间并不存在直接关联,福利国家只是特定政策土壤下的偶发现象。^⑤

综上,当前的因素分析框架为理解西欧福利国家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既有的西欧福利国家建构研究在经验事实和理论建构层面也存在局限和不足。第一,工业主义主要由国内经济发展因素所驱动,而国际债务融资与国际借贷的介入削弱了国内经济因素在福利支出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国内经济发展因素不能直接转化为有效的福利支出,其实际效果受到再分配等相关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的影响和制约。^⑥第二,

^① Bernard E. Brown, “Europe’s Rise—NATO’s Demis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23, No.5, 2001, p.285.

^② Dani Rodrik,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6, No.5, 1998, pp.997-1032.

^③ Evelyne Huber and John Stephens,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arties and Policies in Global Market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11.

^④ Dani Rodrik, “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pp.997-1032.

^⑤ Tony Atkins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at the Opening and the Clos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Henryk Kierzkowski, ed., *Europe and Global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249-273.

^⑥ 郑秉文:《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45-46页。

关于财政汲取能力因素,逆周期财政原则作为竞争性观点,明确提出经济下行时公共支出需求增强,经济上行时支出压力相对减轻。^①第三,权力资源理论中的诸多观点也面临质疑与挑战,政党间原本鲜明的政策主张逐渐模糊化,各党通过将纲领内容扩展至公共政策领域,导致政策计划趋同。^②第四,国际战争冲突因素的讨论应当更加细化,例如,应区分国家是否直接参与战争、是否遭受占领、物资破坏及人员损失程度等。第五,政治制度竞争存在经验反例。例如,拿破仑战争及其主导的“大陆体系”。尽管英法之间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制度竞争,且法国实施封闭的政治经济体系,但这一时期福利国家并未兴起。因此,政治制度竞争在福利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具有经验局限性。第六,经济全球化因素因与福利国家建构间关系的复杂性,难以有效辨识其真实联系。

值得重点提及的是美国的安全保护因素,学界对此因素已有相关研究,但缺乏深入且细致的讨论。安全保护涵盖军事援助和军队部署等诸多领域,需要明确概念并聚焦关键领域。本文选取军事援助作为分析框架的核心内容。作为外部支持力量,美国军事援助在冷战初期有效缓解了西欧国家在军事安全与社会福利之间的资源配置困境,减轻“枪炮”领域的压力,激励其在“黄油”领域的投入。

二 从军事援助到西欧福利国家建构:逻辑与机制

冷战初期,美国通过提供军事援助,促使西欧国家实现了防务外包,从而有效缓解了其财政压力。此举帮助西欧国家释放了政策空间,使其能够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社会福利建设。

(一)集体行动逻辑:美国军事援助促进西欧防务外包

在国际社会中,政治行为体为了实现共同目标或追求共同利益,选择集体行动。集体(或组织)一旦形成,就必须面对成员间在成本承担与利益分配上的不对等问题。^③集体中实力显著优于其他成员的主导国通常倾向于自愿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并提供相

^① João Tovar Jalles et al., “Revisiting the Countercyclicality of Fiscal Policy,” *Empirical Economics*, Vol.67, No. 3, 2024, pp.877-914.

^② 郭静:《解析当代英国执政党竞选中的福利主张——政党竞争与福利政策》,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2期,第30页。

^③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应的支持,从而增强集体组织的稳定性与凝聚力。^①较弱的成员国能够利用主导国所创造的“优渥条件”减轻某些领域的成本负担,并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重新配置到更为优先或关键的领域。由此,在集体行动的逻辑框架下,美国军事援助促进了西欧防务外包。

具体而言,美苏冷战对峙塑造了高度集群化和组织化的国际格局。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明确将欧洲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了地缘上的划分——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横贯欧洲大陆。1949年4月,美国与英国、荷兰、卢森堡、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丹麦等诸个国家共同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为冷战期间西方阵营的核心战略与军事组织,为应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军事威胁提供了集体安全保障。^②值得一提的是,集体安全原则还延伸至其他亲西方的中立国家。奥地利的中立地位表面上超然于国际冲突,实则为美苏冷战的产物,这并非奥地利的自主选择。冷战期间,美苏双方共同确认了奥地利的中立地位,旨在缓解东西方阵营的紧张局势,将奥地利作为战略缓冲区。特别是苏联,为了防止美国在奥地利的军事扩张,坚决要求其维持中立,且不得加入西方军事组织(如北约)。尽管形式上保持中立,但奥地利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阵营保持紧密联系,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合作和军事安全、情报共享机制,表明其战略上倾向于西方阵营。^③由此,美国凭借战后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力,与西欧国家共同构建了以自身为核心的国际组织体系。

相应地,美国在组织体系内的主导国地位需要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为西欧国家提供“俱乐部产品”。而契合集体安全原则的核心领域为军事安全,手段包括军队部署、军事援助等。西欧国家在享受美国安全保护的过程中,实际上将本国防务进行了外包,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军事开支。北约欧洲成员国在1950—1960年间的国防支出仅占苏联军费开支的60%,且该比例在后续时段逐步下降。^④不仅如此,西欧国家与东欧集团的军费开支差距异常明显。例如,东欧集团在1984年的总国防支出高

^① Mancur Olson, “A Theory of the Incentives Faci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Neo-Corporatism and the Hegemonic Stat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 No.2, 1986, pp.165-189; John Oneal and Mark Elrod, “NATO Burden Sharing and the Forces of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4, 1989, p.448.

^② Federico Fabbrini, “Do NATO Obligations Trump European Budgetary Constraints?” *Harvard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Vol.9, No.2, 2018, pp.128-129.

^③ Michael Allen, Michael Flynn and Carla Machain, “US Global Military Deployments, 1950-2020,”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39, No.3, 2022, pp.351-370.

^④ John Oneal and Mark Elrod, “NATO Burden Sharing and the Forces of Change,” p.443.

达 2700 亿美元,而西欧国家仅为 910 亿美元。^①从备战的常规思维角度分析,西欧国家的军费开支难以应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压力,但其之所以能够保持较低的国防支出,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提供了集体安全支持。西欧国家无需承担与对手阵营相当甚至更高的国防开支,而仅需维持适度的国防投入,即可在战略上与东欧集团国进行对峙。有学者通过标准化分数(Normative Scores)评估冷战期间集体安全原则下北约成员国的负担指数。研究表明,美国在 1950 年至 1967 年间的军费支出显著高于其他成员国,其负担指数达到了 1.30,表明美国在北约集体防务中的财政负担较为沉重。倘若将此现象假定为偶然事件,则美国单独承担额外负担的概率仅为 1/32768,此极低概率也证明该现象并非偶然,^②而是西欧国家依赖美国的军事安全支持,实现了防务外包。

美国的军事安全支持主要通过军队部署提供防御性安全保障和通过军事援助增强西欧国家的主动防卫能力等方式实现。对于军队部署而言,美国在西德的军队人数显著高于其他西欧国家,在高峰时期接近 30 万人。而在法国和英国的军队部署规模虽然未达到西德的水平,但仍明显高于其他西欧国家。其中,法国在高峰时期的部署人数约为 7 万人,英国约为 6 万人。其他有派驻美军的国家(丹麦、意大利、挪威、比利时和荷兰等),部署人数通常维持在数千人至万余人之间。^③由此,形成了针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层次化与阶梯化防御体系,其中西德、法国和英国作为美军部署的核心国家,承担了关键的防卫角色。具体而言,西德作为毗邻苏东国家的前沿阵地,承担第一道军事安全防线的职责。法国和英国则因相对较弱的军力部署及相对靠后的地理位置,担当第二道防线的角色,既为第一道防线提供后备支持,也能凭借较为可观的军队部署规模迅速转化为新的安全防线。军队部署通常依据宏观战略布局进行规划,未必充分考虑各个西欧国家的实际效果,因此,或许难以满足特定国家的安全诉求。^④

与被动的军队部署不同,美国的军事援助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通过能力建设增强西欧国家的自我防御水平,而非仅限于防御性保护。同时,军事援助根据各国的具体需求定向支持,而不单单依赖整体战略布局中的部署,有效地弥补了西欧国家的国防短板。因此,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看,美国军事援助应视为影响西欧国家防务

① John Oneal and Mark Elrod, "NATO Burden Sharing and the Forces of Change," p.453.

② Ibid., pp.445-447.

③ Michael Allen, Michael Flynn and Carla Machain, "US Global Military Deployments, 1950-2020," pp.351-370.

④ 后续的回归分析、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将该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系统地测试其对结果的影响。

承担(或集体安全)的关键因素。实际上,美国通过“军事援助计划拨款”(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 Grants)、“对外军事信贷融资”(Foreign Military Credit Financing)、“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计划”(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过剩国防物资转让”(Transfers of Excess Defense Articles)以及“其他形式的拨款”(Other Grants)等为西欧国家提供了资金和物资支持。^① 拨款形式的军事援助(现代化武器和后勤支持),不仅提升了受援国的军事实力,还推动了北约成员国的武器装备和战术操作的标准化,增强了集体防御能力。美国通过对外军事信贷融资帮助西欧国家低息或无息购置军事装备,减轻其财政压力,同时支持装备的操作培训和维护,提高了装备的使用效率。过剩国防物资转让是将淘汰或多余的军事装备低成本地提供给受援国,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缓解了受援国财政负担。此外,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计划提高了西欧国家军官的战略和战术能力,促进了美欧军官的跨国合作与信息共享。总之,通过细化军事安全支持的内容并进行辨析,排除军队部署的干扰因素,可以确认美国军事援助促进了西欧的防务外包。

需要强调的是,集体或组织可被视为“圈子”,其成员的吸纳要经过筛选。只有在满足特定标准或承担相应成本的前提下,一个国家方能获得主导国及其他成员国的援助与支持。美国通过向西欧国家提供特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建立了基于共同利益与制度性安排的集体安全共享体系。作为回报,西欧国家承诺支持和配合主导国的战略和政策,包括支持其外交方针或参与军事行动,甚至可能允许主导国在其领土驻军并设立军事基地。通过这些行动,西欧国家满足了加入集体安全体系的资格和条件。因此,主导国(美国)与其他成员国(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依赖,而是存在显著的利益交换。

(二)“枪炮”和“黄油”的权衡:从防务外包到福利投入

国家通常在“黄油”领域与“枪炮”领域之间权衡并进行资源配置。其中,“黄油”领域主要涉及民生支出,因其直接关系到民众福祉,故更易获得认同与支持。国家在资源配置中通常会优先考虑该领域。“枪炮”领域的建设作为预防性投资,旨在抵御无政府状态下的潜在威胁,从而确保国家安全。然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国家必须在福利建设与国防支出之间进行理性权衡,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换言之,“枪炮”和“黄油”存在显著的互斥关系——某领域的财政支出需要以牺牲另一领域的财政投入

^① Karl Derouen and Uk Heo, “Reward, Punishment or Inducement? US Economic and Military Aid, 1946–1996,”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15, No.5, 2004, p.470.

作为代价。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曾指出,军费支出会直接挤占民生领域的资源配置。例如,一架战斗机的成本相当于50万蒲式耳的小麦,而一艘驱逐舰的开支足以为8000人提供住房。^①

冷战初期,西欧国家同时面临国际与国内双重政治压力,陷入“枪炮”“黄油”权衡的两难困境。在国际政治层面,美苏对峙迫使西欧国家迅速卷入新一轮的国际政治对抗与博弈之中。面对潜在的大规模热战,尤其是普遍预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西欧各国必须将军事安全置于国家发展议程的核心位置。在国内政治层面,西欧国家面临弥合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社会创伤的紧迫任务,亟需扩大公共福利支出以促进社会恢复与稳定。换言之,战后福利支出的需求端迫切需要得到满足。^② 所以,过度关注军事安全支出可能导致国内政治不稳定,甚至引发政权更替;而若过度侧重社会福利支出,则可能削弱国家的安全防御能力,引发外部安全危机。正如克莱门(Daniel Kelemen)所言,军事防务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取舍是国家财政困境的核心,平衡两者的需求对于国家财政而言极具挑战性。^③ 总之,冷战初期的西欧国家面临比传统“枪炮”“黄油”权衡更复杂的政治危机,即必须在资源分配上同时兼顾军费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

那么,如何同时兼顾“枪炮”领域和“黄油”领域呢?实际上,危机与困境的根源在于国家资源的有限性。倘若考虑国际资源供给,依赖外部援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约束。从理性决策的角度思考,外部援助更倾向于哪个领域呢?毫无疑问是“枪炮”领域的军事援助。原因在于,社会福利具有强烈的内政属性,使得外部援助在该领域的介入面临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同时,福利政策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政党往往将社会福利政策纲领作为竞选成功的关键筹码。如果其他国家介入并影响社会福利政策领域,社会契约可能会被重构。因此,外部援助在“黄油”领域的成本较高,且因社会福利领域的内政属性,也难以有效介入。而军事援助直接关联国家安全,通常具有较高的可接受性和稳定性,易获得政府和公众的支持。由此,军事援助作为外部支持,成为西欧国家打破军费支出与福利支出之间两难困境的最优策略选择。事实上,西欧国家也确实希望通过美国军事援助来应对战后重建及安全保障的挑战。贝文(Ernest Bevin)于1948年提出建立西方联盟的倡议,其真正意图并非单纯推动欧洲的独立,而是通过此举向美国发出求助信号。表面上,欧洲表示将在美国的军

^① Susan Eisenhower, “50 Years Later: A Reflection on the Farewell Address,” *The Washington Post*, 16 January 2011, <https://susaneisenhower.com/2011/01/16/50-years-later-were-still-ignoring-ikes-warning/>.

^② Herbert Obinger, Klaus Petersen and Peter Starke, eds., *Warfare and Welfare: Military Conflict and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③ Federico Fabbrini, “Do NATO Obligations Trump European Budgetary Constraints?” pp.141-142.

事援助下重建战后被破坏的地区,但事实表明,只有美国的直接介入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①与此同时,美国也接受了西欧国家的提议,放弃了其国务院主张的相对审慎、独立的外交政策方针,转而深化与西欧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

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不仅有效减轻了后者的军事财政负担,还通过防务外包促进了社会福利领域的优先投资。美国的军事援助有效地将西欧国家的军费支出负担转嫁给美国,从而为西欧国家释放了财政资源和政策空间,使其将重心转向社会福利建设,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有学者认为,主导国通过减轻成员国的国防负担,促使成员国政府削减国内军事装备生产,将资源重新配置至民生领域,增加福利支出的比例。^②

西欧国家将更多资源集中于公共社会支出,推动相关福利政策的出台与落实,进入了福利发展的“黄金时代”。^③自1952年起,西欧国家逐步摆脱了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局面。在1950年至1955年间,欧洲平均生产力提升了26%。^④从1960年到198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由27%上升至42%,增长幅度超过50%;同期,公共部门就业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平均比重也由11%升至18%,增幅约为三分之二”。^⑤更为显著的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发生了转变——从传统的国防、公共管理和一般经济服务支出,转向社会福利领域,如医疗、教育和转移支付。^⑥当时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指出,(我们)有生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繁荣的景象,甚至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历史阶段都未曾体验过。^⑦

总之,在美苏冷战格局下,西欧福利国家建构受到集体行动逻辑和“枪炮”与“黄

^① Lawrence Kapl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The Formative Year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4, p.184.

^② Michael Barnett and Jack Levy, “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The Case of Egypt, 1962–7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 No.3, 1991, pp.369–395; James Morrow, “Arms Versus Allies: Trade-offs in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2, 1993, pp.207–233; Michael Allen and Matthew DiGiuseppe, “Tightening the Belt: Sovereign Debt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7, No. 4, 2013, pp.647–659; Anessa Kimball, “Political Survival, Policy Distribu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4, 2010, pp.407–419.

^③ Christopher Pierson,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 Polity Press, 1991.

^④ “The Blast of World War II,”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history-of-Europe/The-blast-of-World-War-II>.

^⑤ Anwar Shaikh, “Who Pays for the ‘Welfare’ in the Welfare State? A Multicountry Study,” *Social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70, No.2, 2003, p.532.

^⑥ *Ibid.*

^⑦ Harry Mc Phail, “Throwback Thursday: Harold MacMillan’s ‘Never Had It So Good’ Speech,” *Bedfordindependent*, 5 September 2019, <https://www.bedfordindependent.co.uk/throwbackthursday-harold-macmillans-never-had-is-so-good-speech/>.

油”权衡的双重塑造。在集体行动逻辑的框架下,美国的军事援助有效缓解了西欧国家在“枪炮”“黄油”权衡中的两难困境。通过降低西欧国家在军费支出上的负担,为其提供了相对充裕的财政资源,进而推动了西欧福利国家的发展。^①

三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能够有效地测量和识别美国军事援助对西欧福利国家建构的影响,并揭示其相互关系。通过假设检验和稳健性讨论,回归分析能够系统地确证关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一) 案例选择与变量测量

案例选择聚焦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西欧国家”。在此基础上,对案例中涉及的核心变量进行系统化测量,为实证检验提供坚实的量化依据。

1. 案例选择

在案例选择方面,其核心在于明确被美国纳入其战略阵营的西欧国家。根据经验事实和学界普遍观点,本文选取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西德、法国、冰岛、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和英国这 11 个西欧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时段设定方面,既需要涵盖西欧福利国家迅速崛起的关键时期,也应当包含美国军事援助显著削减的历史阶段。因此,研究时段确定为 1950 年至 1967 年。在此期间,西欧国家经历了从战后重建到福利制度完善,并迈入“黄金时代”的关键发展阶段。同时,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统计,1967 年,美国对西欧国家的军事援助显著收缩,因此,该年份被设定为研究时段的终点。

2.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福利水平。当前学界最为认可的福利水平测量方式为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例。^② 因此,本文采用该指标来衡量西欧国家的福利水平。由于研究时段为 1950 年至 1967 年,此期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许多西欧国家未能及时、系统地收集和发布社会福利的相关统计,导致数据缺失问题严重。^③ 所以,本文选取学界广泛认可的阿尔伯

^① Peter Duignan, *NATO: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24-25.

^② Jungkeun Yo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11, No.2, 2009, p.10.

^③ Peter Lindert, “Social Spending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OECD, *How Was Life? Volume II: New Perspectives on Well-being and Global Inequality since 1820*, OECD Publishing, 2021, pp.72-102.

(Jens Alber)提供的统计资料作为数据来源。^①同时,由于他提供的数据未涵盖冰岛和葡萄牙,故结合冰岛统计局数据^②及琼森(Gudmundur Jonsson)关于冰岛社会支出占GDP比例的趋势图,^③来测算冰岛的福利水平。此外,葡萄牙福利水平的测算基于卡罗洛(Daniel Fernando Carolo)和佩雷里尼亚(José António Pereirinha)的统计资料。^④

(2)关键自变量:美国军事援助水平。本文采用美国对西欧各国的年度军事援助的“恒值美元”(Constant Dollars)总额作为衡量其军事援助水平的指标。相关数据可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官网获取。^⑤

(3)控制变量:美国军队部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汲取能力、民主水平、欧洲局势的紧张程度、美苏政治制度竞争以及经济全球化程度等因素。鉴于上文已提到美国军事安全支持包括军队部署和军事援助等形式,因此,在将美国军事援助作为核心自变量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忽略美国军队部署引发的“省略变量偏差”(omitted variable bias)。所以,需将其纳入回归模型进行控制。其中,军队部署水平仅以驻军人数作为衡量标准可能会忽略受援国对美国军队部署的依赖程度。因此,本文采用较为常用的测量方式,即每百万美元军费支出所对应的美国驻军人数。相关数据可从艾伦(Michael Allen)等学者统计和汇编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队部署数据集^⑥和全球军费开支数据集(Global Military Spending Dataset, GMSD)中获取。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因素强调经济的作用,学界通常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核心衡量指标。相关数据来源于OWID(Our World in Data)平台的汇编与整理。学界通常使用税收占GDP比例和库格勒(Jacek Kugler)等学者提出的相对政治汲取能力指标来衡量财政汲取能力。然而,这些方法无法完全适用于冷战初期西欧国家的财政收入状况,也覆盖不了1950年至1967年这个研究时段。因此,本文采用所得税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例作为指标。该指标能够反映税收制度的效率、经济体的税收负担能力和政府的经济干预程度,同时与早期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强化直接征税(尤其是所得税)以显著增加税收收入的

① Jens Alber, "Som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1949-1977,"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15, July 1982.

② Guðmundur Jónsson and Magnús S. Magnússon, eds., *Hagskinna: Sögulegar hagtölur um Ísland*, Hagstofa Íslands, 1977, <https://baekur.is/bok/8f318e69-dc49-4a9f-a8ec-805b2352bad0/0/36/Hagskinna#page/n35/mode/2up>.

③ Gudmundur Jonsson, "The Icelandic Welfare Stat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26, No.3, 2001, p.259.

④ Daniel Fernando Carolo and José António Pereirinh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Portugal: Trends in Social Expenditure between 1938 and 2003," *Revista de Historia Economica—Journal of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Vol.28, No.3, 2010, pp.498-499.

⑤ USAID, "The Greenbook," <https://www.usaid.gov/developer/greenbookapi>.

⑥ Michael Allen, Michael Flynn and Carla Machain, "US Global Military Deployments, 1950-2020," pp.351-370.

历史背景相契合。OWID 为该测量指标提供了数据信息,能够满足 1950 年至 1967 年期间的的数据需求。权力资源理论及相关因素包含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关注点是民主程度。毕竟,民主塑造了政党、工会等政治内容。因此,本文利用 V-Dem (Varieties of Democracy) 数据集的参与民主指数来测定西欧国家的民主水平。欧洲局势的紧张程度深刻反映了美苏冷战对抗的激烈程度,但此概念较为抽象,缺乏直接的、可操作的测量标准。因此,本文采用欧洲地区激烈竞争关系国家对于数占全球非和平关系总量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以呈现美苏两国在欧洲地区博弈的强度与烈度。关于该变量的测量结果由 OWID 进行统计整理。^①美苏政治制度竞争主要集中于军备竞赛和外交博弈两个关键领域,因而可在军事与外交层面对竞争强度进行测量与分析。其中,军事竞争水平通常使用军费开支占 GDP 比例的指标来加以衡量。为了更好地呈现竞争强度,本文选取两国的年度最大值作为最终指标。相关数据可从全球军费支出数据集中获取。^②外交竞争水平能够通过美苏两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相似度予以呈现。其中,“理想点距离”(Ideal Point Distance)可作为衡量美苏外交立场和观点的重要参考指数。正如梅尔特(Merve Mert)强调,联合国投票相似性——即理想点距离经常被用作衡量政治战略重要性的关键指标。^③当然,联合国每个年度涉及多个投票表决,借鉴军事竞争水平的测量方法,本文对理想点距离的数值同样采用年度最大值作为衡量指标。^④对于经济全球化水平而言,学界普遍认可的测量方法是采用进出口总值占 GDP 的比例作为指标(也可理解为贸易开放度)。^⑤OWID 平台汇编、整理了较为完备且有效的关于贸易开放度的数据信息,可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⑥

(二)模型设定

案例选择和时段设定形成了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该数据特性与“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 FEM)的应用场景高度契合。该模型在分析面板数据时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有效控制未观测个体效应可能引发的潜在偏差,从而提高分析结果的

^① OWID, “Peaceful and Hosti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ates,”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peaceful-and-hostile-relationships-between-states?country=OWID_WRL~OWID_EUR.

^② Miriam Barnum et al., “Measuring Arms: Introducing the Global Military Spending Datase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9, Issue 2-3, 2025, pp.540-567.

^③ Merve Mert, *The Parameters Of Turkish Foreign Aid Policy In The Akp Era*, Master Thesis, Sabancı University, July 2023.

^④ Erik Voeten, Anton Strezhnev and Michael Bailey,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Data,”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LEJUQZ>.

^⑤ Antoni Esteveordal, Brian Frantz and Alan Taylor, “The Rise and Fall of World Trade, 1870-1939,”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8, No.2, 2003, pp.359-407; Mariko Klasing and Petros Milionis, “Quantifying the Evolution of World Trade, 1870-194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92, No.1, 2014, pp.185-197.

^⑥ OWID, “Globalization Over 5 Centuries,”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globalization-over-5-centuries-km>.

准确性和可靠性。通过剔除个体间不变的异质性因素,该模型能够更为精确地捕捉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固定效应模型可表示为:

$$Y_{it} = \alpha_i + \beta X_{it} + \varepsilon_{it}$$

其中, Y_{it} 是第*i*个个体在第*t*时间点的因变量, α_i 是第*i*个个体的固定效应,即不可观测的、与时间无关的特质, X_{it} 是第*i*个个体在第*t*时间点的自变量(或一组自变量), β 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研究所关注的影响,而 ε_{it} 是随机误差项。

本文对所设定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 F 检验(F-test)和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结果均通过检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此外,为确保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有必要进行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变量间的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水平均较低,未超过既定阈值,因此,能够继续推进后续回归分析。

(三)数据描述与回归分析

本文汇总、收集了 1950 年至 1967 年间 11 个西欧福利国家的面板数据,得出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整体而言,样本观测数量满足大样本分析的需求,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等描述性统计结果表现良好,反映出数据的适度差异性与波动性。

表 1 以社会支出占 GDP 比例为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支出占 GDP 比例(%)	195	11.073	4.019	2.250	18.800
美国军事援助金额(亿美元)	198	6.032	14.506	0	127.561
美国军队人数/每百万美元军费支出	188	6.637	17.023	0.018	88.462
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198	2690.998	2997.966	11.765	11439.231
所得税占政府总收入比例(%)	183	30.611	10.914	7.900	54.900
参与民主指数	198	0.510	0.161	0.042	0.732
欧洲与全球在激烈竞争关系数量上的比值	198	0.114	0.046	0.058	0.200
美苏军费支出占 GDP 比例较大值	198	40.014	7.322	28.265	52.984
理想点距离值较大值	187	5.166	0.545	4.109	5.933
贸易开放度	198	49.731	22.301	15.276	95.319

注:表由作者自制。

如表 2 所示,主要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在模型(2)中,关键自变量美国军事援助水平(美国军事援助金额)与西欧福利水平(社会支出占 GDP 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其回归系数为 0.017,且呈现出统计显著性($p < 0.1$)。由此可见,美国军事援助有效地促进了西欧国家的福利建构。

表 2 主要回归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社会支出占 GDP 比例 (%)	社会支出占 GDP 比例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千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千美元)	核心西欧国家	非核心西欧国家
美国军事援助金额(亿美元)	-	0.017 *	-	0.020 ***	0.029 ***	0.009
		(1.904)		(3.501)	(2.654)	(0.235)
美国军队人数/每百万美元军费支出	-0.024 *	-0.022	-0.055 ***	-0.053 ***	0.188 **	-0.025 **
	(-1.734)	(-1.637)	(-5.184)	(-5.203)	(2.287)	(-2.166)
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0.000	0.000	0.000 ***	0.000 ***	0.001 **	0.006 ***
	(1.371)	(1.638)	(4.020)	(4.699)	(2.461)	(3.508)
所得税占政府总收入比例(%)	0.107 ***	0.110 ***	0.026	0.031	0.147 ***	0.059
	(3.496)	(3.615)	(1.083)	(1.371)	(3.080)	(1.349)
参与民主指数	15.879 ***	16.671 ***	11.138 ***	12.159 ***	27.723 ***	12.292
	(3.033)	(3.202)	(2.770)	(3.126)	(3.704)	(1.417)
欧洲与全球在激烈竞争关系数量上的比值	-28.820 ***	-31.213 ***	-28.835 ***	-31.979 ***	-29.996 ***	-16.780 ***
	(-8.122)	(-8.357)	(-10.530)	(-11.463)	(-4.333)	(-3.396)
美苏军费支出占 GDP 比例较大值	-0.006	-0.006	0.018	0.019	-0.032	0.008
	(-0.381)	(-0.412)	(1.484)	(1.592)	(-1.397)	(0.458)
理想点距离较大值	0.418 *	0.464 *	0.016	0.093	0.444	0.390
	(1.738)	(1.938)	(0.084)	(0.516)	(1.259)	(1.481)
贸易开放度	-0.006	-0.008	-0.033 **	-0.037 ***	-0.113 ***	0.010
	(-0.323)	(-0.422)	(-2.250)	(-2.626)	(-2.766)	(0.566)

常数项	0.784	0.227	7.650***	6.800***	-1.522	-2.573
	(0.243)	(0.071)	(3.096)	(2.839)	(-0.313)	(-0.551)
观察数	166	166	169	169	90	76
R平方	0.663	0.671	0.831	0.844	0.713	0.769
*** $p < 0.01$, ** $p < 0.05$, * $p < 0.10$						

注:表由作者自制。模型系数如果显示为 0.000,表明该系数的实际值非常小,在小数点后第四位才开始显现。括号内为回归分析的 t 值结果。

(四) 稳健性检验

当前学术研究中广泛接受更换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方法。因此,本文重新调整了因变量,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核心测量指标。此项调整主要基于以下考量:首先,从数据可得性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能够较为完整地覆盖本文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其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支出占 GDP 比例的测量方式提供有效的补充。

如表 2 的模型(4)所示,美国军事援助呈现出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回归系数为 0.020,也具备高统计显著性($p < 0.01$)。这也再次表明了美国军事援助在推动西欧国家福利建构的关键性作用。

(五) 异质性分析

在美苏冷战的结构性压力下,西欧国家中存在支持美国抗衡苏联的核心和非核心国家。其中,比利时、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和英国可被视为核心国家,而奥地利、丹麦、冰岛、挪威、葡萄牙等为非核心国家。^① 鉴于此,本文通过回归模型对西欧核心与非核心国家进行异质性分析,探讨美国军事援助的更深层次解释。

如表 2 所示,模型(5)中的核心西欧国家的福利水平受到美国军事援助的显著正向促进,系数为 0.029 且统计上显著($p < 0.01$)。而模型(6)中的非核心西欧国家的福利水平未受美国军事援助的显著影响。因此,美国对西欧国家的军事援助在核心与非核心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冷战期间,核心国家承担了抗衡苏联及其盟国前沿阵地的角色,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密切且持续,对军事援助的依赖程度也较高。

^① 此外,部分观点将比利时视为非核心国家,也即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和英国为核心西欧国家,而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冰岛、挪威、葡萄牙为非核心国家。本文根据这一界定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核心西欧国家的福利水平显著受美国军事援助的正向促进,系数为 0.036 且统计显著($p < 0.01$),而非核心西欧国家的福利水平未受到美国军事援助的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正文中将比利时归类为核心国家的观点一致。

这些国家通过美国的军事援助保障自身安全,同时释放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稳定和社会福利建设。因此,军事援助对核心国家的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非核心国家在冷战期间的战略地位较为边缘,面临的外部威胁较小,其对美国军事援助的需求较为有限。美国对其军事援助主要限于提供基础安全保障,对福利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福利水平的变化更多地受到其他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的驱动。非核心国家能够通过自主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政策推动福利制度的发展,因此,美国军事援助与非核心国家福利水平之间未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总之,对核心国家与非核心国家的异质性分析深化了对不同组类国家的解释,并增强了理论建构与回归结果的深度。从整体上看,表2中的模型(2)呈现出美国军事援助对于西欧国家的显著促进作用,且利用异质性分析使模型(5)也表现出该因素对核心西欧国家福利水平的正相关性,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四 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国际关系中的现象和结果通常由多重因素交织而成,单纯依赖回归分析揭示的因素间平均效应,难以深度呈现因素间的复杂关系。为此,“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用于评估美国军事援助对西欧福利国家建构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军事援助因素并未呈现出必要性,却在组态分析中作为核心条件出现。

(一) NCA 和 fsQCA 的混合研究方法

fsQCA方法基于“多因一果”的理念,^①强调多重因素交互产生对结果的共同作用。倘若在fsQCA结果中,某条件因素被识别为结果变量的核心条件,则可确认其对研究现象具有关键性影响。

而在运用fsQCA方法之前,有必要对各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仅当确定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不构成必要条件时,方可纳入后续的组态分析。迟永指出,倘若因素能够对结果产生必要性影响,就没有必要纳入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中。^②然而,目

^① 林艳、卢俊尧:《什么样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能提高区域创新绩效——基于NCA与QCA的研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年第24期,第21页。

^② 迟永:《美国介入领土争端的行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73-74页。

前 fsQCA 分析仅能够从定性层面评估“条件对结果是否构成必要性”,而无法在定量层面准确测量和呈现条件必要性的具体程度。^①因此,为了全面且完整地检验因素的必要性,需要纳入 NCA 方法作为重要的辅证工具。

(二) 案例选择、数据调整与变量校准

NCA 与 fsQCA 研究方法继续沿用回归分析中的案例与数据,有效避免因案例或数据更替引发的结论不可靠问题。回归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和样本量满足大样本分析的要求,而 NCA 与 fsQCA 方法更适用于中等样本量的研究。^②所以,学界惯常采用均值化的处理方式来满足 NCA 与 fsQCA 方法的数据需求。^③此外,某些条件因素在均值化处理后为恒量,不再适用于 NCA 与 fsQCA 方法。正如拉金(Charles Ragin)所言,“条件变量必须是变化的”。^④而剔除恒量后,剩余条件变量的数量恰好符合 fsQCA 方法的要求。^⑤

在完成 NCA 与 fsQCA 方法的前期准备工作后,需要对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校准(Calibration)。校准依据目前较为普遍的 75%、50%、25%分位数进行操作。^⑥经过校准后的数值介于 0 和 1 之间,其中[1]代表完全隶属于某集合,[0]代表完全不隶属某集合,而[0.5]则代表交叉点或模糊点。本文将交叉点或模糊点的 0.5 数值调整为 0.499(见表 3)。

表 3 集合、变量校准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集合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分析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福利水平	8.750	11.089	14.411	11.118	3.768	2.635	15.461
美国军事援助	1.660	4.605	6.233	6.032	6.343	0	22.432
美国军队部署	0.186	1.128	2.885	6.623	15.283	0.073	51.722

①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载《管理世界》,2020年第9期,第146页。

② [比]伯努瓦·里豪克斯,[美]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杜运周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③ 相关操作依据可参考毛益民、陈国权:《民主反腐的情境适配: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2期,第84页。

④ [比]伯努瓦·里豪克斯,[美]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第25页。

⑤ 同上。

⑥ 杜运周等学者较为认可“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25%)”的校准规范,详细可参见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第147页。

经济发展水平	422.255	1011.775	5385.046	2690.998	2964.352	19.093	8004.332
财政汲取能力	19.900	27.907	39.322	30.262	10.945	16.676	49.412
贸易开放度	26.472	40.547	67.379	49.731	22.587	23.766	90.618

注:表由作者自制。

(三)分析结果

经过必要条件分析、组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我们能够确认美国军事援助因素对于西欧福利国家建构不具备显著的必要性关系,但却是充分条件组态的核心构件。

1.必要条件分析

NCA 方法利用“上限包络—自由处置边界”(Ceiling Envelopment-Free Disposal Hull, CE-FDH)与“上限回归—自由处置边界”(Ceiling Regression-Free Disposal Hull, CR-FDH)来量化条件变量的效应量、显著性和精确度。^①目前学界通常将效应量的阈值设定为 0.1,即不超过 0.1 的效应量不被视为必要性因素。同时,在 NCA 方法中,通过重复抽样生成的置换样本可为条件变量提供显著性结果。本文依据学界的严格标准,采用 p 值小于 0.01 作为显著性判定依据。^②此外,由于案例数量有限,故对精确度进行设定。若条件变量的精确度低于 100%,则视为不必要条件。总之,使用 NCA 方法检验必要条件需满足:效应量超过 0.1、显著性水平低于 0.01,且精确度必须为 100%。

如表 4 所示,美国军事援助、美国军队部署、财政汲取能力和贸易开放度等条件变量,无论在 CE-FDH 还是在 CR-FDH 检验中,其 p 值始终高于 0.01。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因素在 CE-FDH 方法中的 p 值大于 0.01,且其在 CR-FDH 检验中的精确度低于 100%。所以,从整体结果来看,各个条件变量难以被视为西欧国家高福利水平的必要条件。

表 4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	方法	精确度	效应量	p 值
美国军事援助	CE-FDH	100%	0.015	0.587
	CR-FDH	90.9%	0.124	0.270
美国军队部署	CE-FDH	100%	0.025	0.357
	CR-FDH	81.8%	0.016	0.513

^①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第 148 页。

^② 林艳、卢俊尧:《什么样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能提高区域创新绩效——基于 NCA 与 QCA 的研究》,第 23 页。

经济发展水平	CE-FDH	100%	0.136	0.051
	CR-FDH	72.7%	0.308	0.007
财政汲取能力	CE-FDH	100%	0.018	0.634
	CR-FDH	81.8%	0.047	0.450
贸易开放度	CE-FDH	100%	0.000	1.000
	CR-FDH	100%	0.000	1.000

注:表由作者通过运行 R 和 Rstudio 软件中的 NCA 模块制作。

同时,fsQCA 与 NCA 形成互证。在 fsQCA 方法中,需要重点关注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一致性(Consistency)数值。当数值超过 0.9 时,可认定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①如表 5 所示,在将结果变量设定为高西欧国家福利水平和低西欧国家福利水平后,所有条件变量及其取反变量的一致性均未超过 0.9,表明各条件变量未对西欧福利国家建构起到必要作用。此结论与 NCA 方法的检验结果一致。

表 5 fsQCA 方法的条件变量必要性检验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西欧国家福利水平		低西欧国家福利水平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美国军事援助	0.699	0.695	0.458	0.400
~美国军事援助	0.396	0.454	0.651	0.656
美国军队部署	0.610	0.640	0.569	0.525
~美国军队部署	0.547	0.591	0.610	0.579
经济发展水平	0.720	0.796	0.375	0.365
~经济发展水平	0.425	0.436	0.790	0.713
财政汲取能力	0.455	0.482	0.615	0.574
~财政汲取能力	0.598	0.639	0.445	0.418
贸易开放度	0.504	0.484	0.742	0.626
~贸易开放度	0.610	0.729	0.388	0.408

资料来源:所有数字结果均由 fsQCA 计算得出。其中,~表示该变量取自身值的相反值。

^①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第 148 页;林艳、卢俊尧:《什么样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能提高区域创新绩效——基于 NCA 与 QCA 的研究》,第 23 页。

2. 组态分析

基于 NCA 和 fsQCA 方法的双重评估可以确定,在备选条件变量中,并不存在西欧福利国家建构(或高西欧国家福利水平)的必要条件因素。由此,这些条件因素可充分纳入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的组态分析中。更进一步地,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 PRI 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75,且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 1,进而得到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的分析结果。其中,利用简约解和中间解识别出形成高西欧国家福利水平的两个条件组合路径及核心条件(见表 6)。^①

表 6 西欧福利国家建构的条件组合分析结果

条件	西欧高福利国家水平 (频数阈值为 1, PRI 一致性为 0.75)		西欧高福利国家水平 (频数阈值为 2, PRI 一致性为 0.75)	
	路径(1)	路径(2)	路径(3)	路径(4)
美国军事援助	●	●	●	●
美国军队部署	●	⊗	●	⊗
经济发展水平	●	●	●	●
财政汲取能力		●	⊗	●
贸易开放度	⊗	●	⊗	●
原始覆盖率	0.399	0.274	0.332	0.274
净覆盖率	0.323	0.199	0.298	0.240
一致性	0.975	0.860	0.970	0.860
解的覆盖度	0.597		0.571	
解的一致性	0.928		0.925	

资料来源:所有数字结果均由 fsQCA 计算得出,并采用简约解和中间解绘制。其中,“●”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

路径(1)的组态为美国军事援助 * 美国军队部署 * 经济发展水平 * ~ 贸易开放度。其中,美国军事援助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变量为构成该组态的核心条件。对于组态(1),其原始覆盖率为 0.399,意味着此路径能够解释约 39.9% 的高西欧国家福利水平的案例。同时,净覆盖率为 0.323,且一致性数值为 0.975,证明该组态是高西欧国家福利水平的有效解释路径之一。

^①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第 148 页。

路径(2)的组态为美国军事援助 * ~美国军队部署 * 经济发展水平 * 财政汲取能力 * 贸易开放度。其中,美国军事援助和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核心存在条件。在该路径下的原始覆盖率为 0.274,意味着此路径能够解释约 27.4%的高西欧国家福利水平的案例。而净覆盖率为 0.199,且一致性数值为 0.860,仍然可以较为有效地解释西欧国家高福利水平的案例。

整体来看,全部组态的“解的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为 0.597,表示所有路径能够共同解释约 59.7%的西欧国家高福利水平的案例。与此同时,“解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值为 0.928,表明两条路径整体与对象案例具有较高的吻合度,反映出模型的良好适配性。值得一提的是,学界普遍认为,当解的覆盖度达到 0.5 且解的一致性超过 0.8 时,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和可信度。显然,本次结果远超该阈值,证明其具备较高的可信度。

3. 稳健性检验

在 fsQCA 方法中,能够通过调整案例数阈值进行稳健性检验。所以,本部分将案例数阈值由 1 调整至 2,增加其筛选的严格程度,并获得了相应结果(见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案例数阈值为 2 的设定与阈值为 1 的设定所形成的组态情况很相似。具体而言,路径(3)与路径(1)在条件变量的组态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财政汲取能力作为边缘条件处于缺失状态,而其他条件变量的组合情况保持一致。同样,路径(4)与路径(2)展示出相同的条件变量组态及充分性关系,这表明即便在调整案例数阈值后,所识别出的条件组合和其所对应的充分性关系依然维持稳定。值得强调的是,美国军事援助因素在所有路径中均是西欧高福利国家水平的核心条件,进一步证实了该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充分效应。

五 从军事援助到霸权控制:福利“挟持”的路径

通过回归分析、NCA 和 fsQCA 方法检验,本文发现美国军事援助与西欧福利国家建构存在显著正向促进关系,且处于充分效应组态的核心条件地位。换言之,美国的霸权控制和福利“挟持”深刻嵌套于美国军事援助与西欧国家高福利支出之间的复杂互动之中。

具体而言,国际关系中存在“撤梯”策略,即通过提供外部援助或安全保障等支持,推动受援国的经济社会进步,而在其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后,逐步撤回相关援助,制造安全危机,以此增强受援国对施援国的依赖度。冷战初期,美国大规模军事援助

承担了西欧国家的安全防务,并促使后者福利水平提升至较高标准。而福利水平“易升难降”的特性致使西欧国家进入“高福利锁定”状态,任何削减福利的尝试均会被视为对既定社会契约的违背。换言之,美国军事援助显著正向促进了西欧福利国家建构,但也使之陷入“高福利锁定”的困境。与此同时,美国逐步撤回相关援助和保护,弱化对于西欧国家的军事安全支持(尤其是削减甚至终止军事援助),迫使西欧国家重新面临“枪炮”与“黄油”的两难选择。但由于西欧国家已处于“高福利锁定”状态,这无疑限制其在“枪炮”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因此,尽管面临军事安全领域的脆弱性,西欧国家也无法进行有效补救,仍然需要美国霸权的军事保护。因此,西欧国家的军事安全处于不完全饱和状态,依赖于美国提供的集体安全保障。而作为交换条件,西欧国家需要支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协助其共同压制新兴国家的崛起。简言之,美国利用军事援助塑造了高福利水平,并导致“高福利锁定”状态,从而能够利用福利进行“挟持”,实现霸权控制。

相应地,西欧防务外包^①经历了从实质性传统安全支持向象征性战略承诺“撤梯”的转变。在冷战初期,美国为了帮助西欧国家共同抵御苏联的安全威胁,主要通过军事援助、军队部署(含军事基地建设)和尚未成熟的战略防御体系形成对于西欧国家的安全保护,促使其实现福利国家建构。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主观的战略调整和客观实力的相对减弱显著促进了西欧福利国家建构的核心因素——军事援助被削弱,甚至中断。其中,涉及先进武器出口的物资转让大规模减少,且部分军事援助逐渐倾向于技术领域的合作。这个变化使美国在西欧国家“枪炮”领域的安全保障效用显著下降,致使后者逐渐意识到其军事安全建设的不足,进而增加了安全威胁感知,加剧了防务外包与高福利水平之间的失衡。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在西欧及相关国家的军队部署规模也逐渐缩减,并由传统的大规模常驻军队转向更加灵活的轮换式部署,以降低成本。同时,西欧及相关国家的军事基地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仅保留了少数核心军事基地,且这些军事基地的身份也由冷战时期的“前线堡垒”转变为“后勤情报中继站”,这表明美国在军事基地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已有所下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东欧地区在地缘政治格局中战略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军队部署愈加倾向于该地区。因此,西欧防务外包中的另一核心支撑因素——军

^① 美国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提供了三种主要的安全支持形式,分别是军事援助、军队部署(含军事基地建设)和战略防御体系。其中,军事援助涵盖军事援助计划拨款、对外军事信贷融资和过剩国防物资转让等内容。军队部署将军事基地的建设作为物理支点,从而实现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安全保护。因此,分析军事基地对国家安全支持的力度,实质上是讨论和评估军队部署的有效性。战略防御体系主要包括美国为西欧及相关国家提供的诸如导弹防御和核威慑等安全力量。

队部署受到严重削弱。

时至今日,美国更多地依赖战略防御体系实现对于西欧国家的安全保护。然而,该体系逐步向东欧地区扩展,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对西欧国家战略防御的重视。美国对西欧采取持续性的“撤梯”策略,通过逐步削减安全承诺制造安全焦虑,迫使其在安全上无法彻底“脱美”,进而强化美国的控制。同时,在“高福利锁定”状态的约束下,西欧国家也会陷入“寻求自主—遭遇危机—回归依赖”的循环,而美国通过调控“撤梯”节奏,可确保自身对于欧洲的影响力。

总之,美国军事援助显著促进了西欧福利国家建构,帮助其实现了国家的高福利水平,但该因素也导致西欧国家陷入“高福利锁定”状态和被福利“挟持”的困境。当美国在“枪炮”领域逐渐采取“撤梯”策略,对防务外包的支持力度逐步减弱时,西欧国家却受制于“高福利锁定”状态,仍需维持现有福利标准,这无疑限制了它们在安全领域进行灵活调整的空间,使其因顾虑到高福利水平而被“挟持”,进而更加依赖美国霸权,并被其所控制。

六 结论

冷战初期,美国通过集群化与组织化的方式,将西欧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作为主导者,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有效分担了后者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开支负担。军事援助缓解了西欧国家的安全压力,使其能够摆脱“枪炮”与“黄油”的两难困境,将更多资源投入公共社会支出和福利国家的建设。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军事援助对西欧福利国家建构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在充分条件组态中处于核心地位。

然而,依赖外部国家提供军事安全支持实为短期的、被动的应对方式,会严重削弱国家安全体系。福利水平的“易升难降”导致西欧国家陷入“高福利锁定”状态,限制自身军事安全能力的提升,使其难以有效推进自主防务体系建设。因此,西欧国家“饮鸩止渴”,更加依赖于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框架,以确保国家安全及国内政治稳定。^①而作为交换,西欧国家需要积极支持美国政策,强化其全球领导地位。所以,美欧关系本质上可以理解为美国利用福利“挟持”实现了霸权控制。当然,西欧国家将大量资源集中于社

^① 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意愿承担西欧的军备负担,而欧洲重建自主防务能力也困难重重,参见《欧洲重振防务建设面临挑战》,新华网,2024年6月20日,<https://app.xinhuanet.com/news/article.html?articleId=38c58fa7bcae70748a011e2dac04557c>。

会福利领域而忽视了安全防务建设,也是导致其处于异常脆弱的国家状态的主要因素。然而,当前国际局势的变动与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显著冲击了西欧脆弱的国家状态,为美欧关系的未来演变增添了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三种可能的场景。

场景一:美国继续主导欧洲防务,缓解西欧国家的忧虑。美国的核心利益深嵌于欧洲,倘若放弃对西欧的安全承诺,必将导致权力真空,为其他大国提供战略契机。同时,西欧国家具备遏制新兴大国崛起的能力。例如,美国曾敦促荷兰限制光刻机出口,以阻挠中国在高端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此外,放弃欧洲还可能会使美国的商业利益遭受严重损失。所以,此场景强调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若美国撤回对欧洲的帮助,将导致其全球霸权地位所依赖的西欧支持体系解体,进而对其全球领导地位构成严峻挑战。^①

场景二:美国仍保留部分防务支持和福利“挟持”意愿,但敦促西欧国家发展部分核心能力,以推动其成长为美国的平等合作伙伴。美国鼓励西欧国家专注于开发和获取新型防务能力,以避免单纯复刻北约内部现有的军备体系。该能力包括空中加油机、高空无人机、运输机以及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等关键防务内容,以满足欧盟及北约成员国的集体安全需求。值得一提的是,为应对欧洲各成员国内部政治因素可能引发的防务资金短缺问题,美国通过其政治影响力推动欧盟设立专门的防务资金,更高效地支持欧洲国家的防务建设与能力提升。^② 总之,西欧国家通过建立核心军备能力,既能补充美国的军事力量,又可在特定情况下实现自主行动,减少对美国军事介入的依赖,部分实现防务自主。

场景三:美国放弃防务支持和福利“挟持”,西欧国家联合中东欧国家共同构建防务体系。特朗普二次当选前曾明确表示,如果再次当选,将大幅削减或终止美国对欧洲的军事支持,并公开鼓励俄罗斯对未达到国防开支占比要求的北约成员国采取更为自由的行动。^③ 特朗普竞选团队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具体政策,给出适度减少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的方案,并提出“北约休眠”的概念。^④ 据此,美国退出欧洲只是时间问题。

^① US Army War College, “2024 Annual Estimate of the Strategic Security Environment,” 24 July 2024, <https://publications.armywarcollege.edu/News/Display/Article/3849531/2024-annual-estimate-of-the-strategic-security-environment/>.

^② Max Bergmann, James Lamond and Siena Cicarelli, “The Case for EU Defense: A New Way Forward for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1 June 2021,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case-eu-defense/>.

^③ Nick Witney, “Home Alone: The Sorry State of Europe’s Plans for Self-defence,” ECFR, 19 February 2024, <https://ecfr.eu/article/home-alone-the-sorry-state-of-europes-plans-for-self-defence/>.

^④ Sumantra Maitra, “Policy Brief: Pivoting the US Away from Europe to a Dormant NATO,” The 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 16 February 2023, <https://americarenewing.com/policy-brief-pivoting-the-us-away-from-europe-to-a-dormant-nato/>.

倘若美国终止对欧洲(尤其是西欧)的防务支持,便需要新的安全体系来保障西欧国家安全。当前,德国、法国与波兰正在推动深化“魏玛三角”关系。其中,德法两国由于政治波动和财政约束等因素,难以在军事安全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则率先加快军事建设步伐,并逐步增加对欧洲安全与防务领域的贡献。^①因此,未来欧洲安全格局的重心可能会逐渐转向中东欧地区,尤其是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有望在此过程中提升其在欧洲战略事务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②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对俄罗斯的威胁感知,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霸权所构建的“他者”身份。^③若美国退出欧洲事务,俄欧紧张关系可能会有所缓解。总之,在此场景下,美国退出欧洲后影响力显著削弱,欧洲内部可能开展彼此间的军事安全合作。

但是,上述各个场景难以同时满足利益各方的意愿和诉求。所以,通过有效地整合三个场景,可形成对未来美欧战略的构想,即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吸纳中东欧国家,实现西欧乃至美国防务的“再外包”。此战略构想在满足美国霸权护持的同时,兼顾西欧国家的防务保障,以及中东欧国家扩大国家影响力的战略愿望。所以,如果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中东欧,将有助于降低霸权维系成本,更有效地建立应对威胁的机制与战略。而西欧国家利用自身优势,推动集体安全框架中核心军备能力建设,将有效弥补现有体系的不足,提升整体防御效能。中东欧国家则借助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结合美国霸权护持与自身安全诉求,可增强抵御俄罗斯威胁的能力。同时,与西欧国家相比,这些国家不存在高福利支出的桎梏,可以更灵活地将财政资源投入军事建设。中东欧国家政治与战略地位的提升可能促使战略重心向该地区倾斜。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美欧战略构想在推行过程中可能会成为国际安全危机的导火索。北约的进一步东扩将对俄罗斯的战略安全构成直接的挑战,激化其安全焦虑,促使其对西方势力扩张做出强烈回应。

(作者简介:崔磊,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2022 级博士研究生;卢凌宇,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教授。责任编辑:蔡雅洁)

^① Henry-Laur Allik, “Weimar Triangle Starts Preparing for a Standoff with Russia,” DW, 27 June 2024, <https://www.dw.com/en/weimar-triangle-starts-preparing-for-a-standoff-with-russia/a-69492503>.

^② Bart Szcwcyk, “Who Will Fill Europe’s Leadership Vacuum?” *Foreign Policy*, 19 July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7/19/europe-eu-strategy-leadership-france-germany-poland-security-russia/>.

^③ 许善品:《美澳对中国—南太合作的“安全化”与中国的政策选择》,载《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 3 期,第 43 页。